

历史向我们走来

——天安门见证中共党史历程之五

闫树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年代,天安门犹如一个没有密码的“黑匣子”,蓄养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却又面目各异。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于“大跃进”时期不按经济规律盲目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中苏关系破裂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时孤立和随之而来的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来的困难,这三年间,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六〇年,天安门观礼台上,无论是“五一”还是国庆节,再也见不到援华的苏联专家代表了。更让人惊奇的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国庆庆典上,当年的“001”号战犯薄仪在观礼台上亮相,第一次参加了庆祝活动。中国政府特赦了一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些罪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改造下,经过学习和劳动,真正改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尤其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巨大成功。薄仪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被特赦的,一九六一年正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关怀下,与一位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婚后,薄仪与李淑贤再次来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六十年代也是出“星”的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英雄,劳模不断涌现。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热潮。接着,毛泽东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

思想品德的榜样;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干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宣传王进喜的先进事迹,为全国工人阶级树立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学习榜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出现了英雄的时代,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一个又一个闪光的名字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闪耀,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史诗,是那个年代无法掩去的人性的美丽。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也塑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六十年代也是出“新”的年代:“半工半读”、红卫兵、红宝书、忠字舞、赤脚医生。新鲜事层出不穷。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我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敌视中国的国家的核讹诈,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上下战胜困难的决心,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风采: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当岁月的钟摆停留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场批判的“暴风雨”开始在“政治空气”中酝酿。尽管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十多人拥向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这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新中国的航船在风风雨雨中驶入了疾风暴雨的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一切都没有停止,历史的车轮一旦产生倾斜,惯性会使它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工人停工,革命!学生停课,革命!农民停耕,革命!一切全停,全部革命。这革命的方向就是“全面夺权”!这一年,八个样板戏开始推行,并代替了老百姓的一切娱乐生活。这一年特别值得庆祝的是中国第一颗氢弹于六月十七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八年在新的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这一年,给千家万户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确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一九七〇年年初,全国已有五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知识青年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这就是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的人数之众多、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广,在中国和世界几乎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场运动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青年颗颗火热赤诚的心,让我们感叹、感动。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做出了

自己独特的贡献。而离别北京时,或途经北京时,在天安门留个影,在那时是绝不可少的一件事。这个留影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记录,也是国史党史的记录与见证。

而在新中国短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一九六九年那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中苏不再口诛笔伐,而是兵戎相见。这一年的三月二日,珍宝岛上边防战士浴血奋战,谱写下壮丽的悲歌!但这一事件还不足以这一年定下主基调。因为这一年的四月一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这次大会上,在这次修改的党的章程里写进了一个人的名字。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身组织严重不纯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随之,共和国历史上、中共党史上最大一出难以言表的悲剧发生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鄧都而逝。

在六十年代留给人们记忆深处最坚硬、最难释怀的部分仍然是那一场狂热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九百七十一页,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记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天安门见证了这场红色风暴的缘起和跌落。正是由天安门广场汇聚而成的红色海洋,当它以海啸般的能量向四面八方冲击的时候,一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局面便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给了七十年代。



一九六七年国庆游行时,文艺大军推着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模型车通过天安门。



于洋

于洋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参加电影界大型活动时,只要不是商业性质的,十之八九都会看到他步履蹒跚却身型健硕的身影。电影人为灾区人民义演募捐,有他;扶持青年电影人项目主题会,有他;关心少年儿童精神文化发展研讨会,有他;坚持电影作品艺术性与民族性的国际交流,有他……还有太多太多次的农村电影放映、全国各地推广优秀主旋律电影等较为基层的主题活动,由于活动地点往往过于偏僻简陋,连很多只是小有名气的艺人都挑三拣四不愿

前往。每到这时,主办方领导都会语重心长地感慨一句:“还好有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事必躬亲地无私支持这些无名无利却意义深远的红色活动。”即便是出席活动如此之繁忙的情况下,于洋老师还多年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组织指导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主评表演学会的“金凤凰奖”。

如果真的编撰一部中国本土的偶像史,那么于洋应该属于那一批中国女性偶像的元老级人物——中国最资深的偶像演员。我曾经边开玩笑边说把这个称谓送给他,得到的回应是于老爷子那一贯感染力极强的笑,还有一句自嘲——“老了,老了。”

于洋一九三〇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九四七年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先后于《桥》、《英雄虎胆》、《水上春秋》、《暴风骤雨》、《青春之歌》、《带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而这些电影的名字,随便哪一个,都足以令祖辈、父辈们激动不已,心驰荡漾。这些优秀的红色电影,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种信仰,一份力量,一颗足以影响几代人的赤子之心。

《英雄虎胆》中的侦察科长、《青春之歌》中的爱国志士……从影半个多世纪以来,于洋扮演过普通军人、党的干部、地下工作者、大学生等等数不清数的人物角色;他所塑造的形象,都是那么勇敢、坚定、刚毅、沉稳、机智、潇洒,正是传说中“高大全”的典型代表。于洋老师有着山东人特有的乐观、豁达、率直和真

诚,他坦言,从形象、气质、生活经历、内心感受等各方面来说,一个人的表演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什么样的形象都能演;自己几十年来扮演的其实都是同一类型的角色——充满阳刚之气的正面人物形象。他说,这些人物使自己的成长受益匪浅,深深铭刻在了他的生命里,更是由于自己基本上都是本色演出,于是在塑造人物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能够做到心无旁骛,顺其自然。

好好演戏,好好做人。于洋老师总是强调角色本身的光辉,将荣誉和嘉奖献给他一起工作的幕后人员;而自己,总是尽一切可能地低调、谦逊,默默耕耘,默默发酵。他对表演的严谨和做事的严格,在电影业内是很有名的。他的银幕形象似乎都是无所不能的,消灭鬼子,智斗敌军,铲除奸细,在其一九五八年风靡全国的影片《英雄虎胆》中,居然还有一段技惊四座的伦巴舞。然而在这

所有“无所不能”的背后,却是于洋为了贴近人物、诠释到位,多年刻苦努力的结果。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电影《水上春秋》中,当年风华正茂的于洋传神地出演了中国泳坛第一代“蛙王”华小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经典之作,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于洋自小生长在海边,确实有一些游泳的底子,但凭此根本不能胜任一个职业游泳运动员的专业动作。为此,剧组专门请来了游泳教练,在教练的精心指导与于洋的百般努力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游泳水平得到了飞速提升,专业而到位地做出了一个职业游泳队员的标准动作。

于洋老师曾经在多个场合骄傲地表示过,“山东人正直、豪爽,直言不讳,信任你会把心窝子掏给你——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无论到了哪里,都很骄傲地说我是山东人。在平时的处事中,我性格也是这样,就是对,错就是错。我演的那些人物,也是这样。”

演戏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是电影人自己评的专业性奖项,于洋担任评委会主任。他反复强调,评选的标准是“德艺双馨”,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在评选过程中完全严格按照标准,也要求其他评委认真遵循。“我们不会不负责任地照顾任何一个演员。即使名气再大的艺人,如果塑造的角色达不到标准,肯定不会入选。”于洋立足于考察演员的理论素质,更注重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人物性格的

把握。他倡议“参选的演员,要把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或者演出体会写成小结,可长可短,但必须有,这样也有助于演员提高自身素质。”于是,一本本综合了老中青三代演员生动鲜活的表演总结集结成册;这是难得的演员自我总结,更是表演理论的系统梳理,从治学和实践各方面来说,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生活却一次又一次给了他致命的悲剧。几年前的春节,于洋的独子、青年导演于晓洋因意外发病不幸去世。至今,一提到爱子,于洋还是会禁不住地老泪纵横。“我心里很难受,闷得慌,憋在心里很多话想说出来。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了,太残酷了,一下子消瘦了几十斤。记得以前有一次儿子问我,老爸,都这把年纪了,还做得这样辛苦?我回答,只要国家需要,只要中国电影发展需要,我愿意去忙

把。儿子是因为电影的拍摄累死了,但我很欣慰,因为他死在了工作中,像一名战士那样,死在了战场上。”即便如此,于洋还是努力调整自己走出丧子之痛,他总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工作还要继续做,不影响工作,这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

于洋自二〇〇三年出演电影《惊涛骇浪》之后,便几乎多年未正式参加电影的拍摄演出,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关心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和青年电影人的培养上。但他始终未改对于表演事业的眷恋,常常表示:“只要身体允许、角色合适,我就演。现在身体还不错,没设那样那样的毛病,我愿意继续演下去。我很想演一个表现几代人之间在观念差异中不断调节融合的影子。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很快,人们的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老年人的思想变化,这些都很意思,我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他也常常谆谆教导一批又一批涌现出的新一代电影人,“现在电影生产周期非常短,有的演员一年要拍好几部电影,年轻人平时更要注重积累,才能把每一份工作做好。现在提供给表演的环境特别好,进行艺术创作的空间特别广,年轻人一定要珍惜自己,要把青年时代过得更充实些,为以后的事业打好基础。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尤其是年轻人,要塑造好的作品和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有强者的灵魂和战斗的精神,用真诚的心感悟作品、感悟人生。”

他走的那天,开追悼会时省市县领导都有参加,出殡时一路上许多人自觉送行,这在于洋是空前的。许多人相互转告:“老红军去世了!”灵车过时两旁的群众低头默哀,过了很久才抬起头来,向家乡这位老红军投向最后惜别与景仰的目光。

家乡最后这位老红军,也许他的一生业绩很平常,虽然有参加过长征的传奇经历,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和位高权重

的风光。他只是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默默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高人一等的排场,也没有个别当官人的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更没有以长征的“壮举”为资本而炫耀,谋取个人利益,荫及家人亲友。而是像无数共产党人一样,恪守自己的普通人生。他的妻子和子女也是如此,如乡民一样谦和平淡,过着常人的生活。

哦,家乡,值得抒写的人物很多,老红军陈伯钦是我心里认为很尊重很值得写的一位革命先辈。他应是每个家乡人心中一座共产党人不倒的丰碑,他身上所展现的一切永远是家乡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熟悉的《毛泽东选集》恐怕是分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一至四卷。之后,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又正式出版发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新中国成立前还出版过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毛选”出版于抗日战争中太行山上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在省级地图上都找不见的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编辑出版

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是邓拓亲笔撰写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虽然被毛泽东本人修改为“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篇社论却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由此可见,早在第一部“毛选”出版之前,邓拓和他的战友们就已经在不断出版各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正式出版“毛选”进行了各种准备。一九四四年四月,革命老区阜

书。这样的速度和质量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版面设计庄重大方,掀开封面就看到铜版精制的毛泽东肖像,像下印着“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铜版由晋察冀画报社协助制作,像页后面依然是扉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录,五个卷又各自有详细目录,正文中每篇著作的题目单占一页,便于查阅。选集共有二十九篇文

我的家乡闽北光泽县,地处闽赣边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各县之一。当年数万群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等活动,被誉为“红遍光泽”。前后有上千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有二百八十七人跟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可是解放后只有一人回来。

回来的这位老红军叫陈伯钦,是家乡光泽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自然村人。早年家贫,父母双亡。七八岁就给地主看牛,后来学剃头。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十七岁那年,他在邻近的地方看到扩红,就跟同伴一起报名参加。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找了个吃饭的地方”!至于什么共产主义、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的大道理,那是后来觉悟了的事。

一九三三年春,他所在的县大队编入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里,他因为有着剃头手艺很受欢迎,长征时他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剃过头。剃头的情景他几十年后依然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在一个村子里,理发班长派他到首长驻地理发。他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理发时,首长关切地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家乡何处等,他一一地回答。也许因为是理发兵,不

是战斗员,他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到解放只负过一次伤。抗日战争他在一九五师担任过副连长,解放战争到过延安学习。因为没有文化,再加上脑部受过伤,解放后他在华东军分区休养团工作,一九五九年他被批准离职回家乡休养。

陈伯钦回乡后,“老红军”就成了家乡人对他的尊称。一是他参加红军早,二是年纪大。家乡从父母官到一般平头百姓都敬重这位革命功臣,在东关临街地方盖了三间平房给他安家。省市领导下来都会去看望他,逢年过节县里都会上门慰问,县里一些重大活动都会请他坐上主席台。到一九八〇年县政协成立时,还让年已六十八岁的他挂了一届政协副主席。

我从小就认识了这位老红军。家乡光泽过去就是一条主街,不足四里长,在街上走来走去都会碰到。他矮胖的个子,一脸憨厚,长年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下身黑裤子,脚下穿着解放鞋,只是夏天才穿一件白衬衣,朴素得像个老农民。我从小到大看着他,印象没有什么改变。他很少讲话,也不张扬,在街上走时人家看到他会主动让路,会亲热地叫他,他也笑着点点头作答。有时也会站在街边看人家下棋和做买卖,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人们看

到会尊敬地向他打招呼,或端把椅子给他坐。他没有文化,说话乡下口音很多人听不懂,但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学校请他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不敢恭维,他讲的不好,口音又重,但我们还是热烈鼓掌。他的口碑一直很好,他的品行让人家感动。他在待遇上是个很自觉的人,很少向组织伸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可以享受一些东西,但他却和普通人一样。家中的房子是公家的,到八十年代扩街要拆时才迁到县委领导的院子。子女的工作也都是自找的,他没有出过面。家乡牛田村陈家人来找,要他出面办点事,他都没去。来人有时会埋怨,他说:“当年那么多人参加红军都没回来,活着的我有什么资格再向组织要什么呢!”

到了九十年代,他已是八十高龄。小县医疗条件差,服务也不周到。好在他离院不远,离他家只有二三百米,他都是自己拄着拐杖到医院看病,一样排队挂号、就医、取药。但人们看到,住住都会主动先让他,他也会推辞几句。

二〇〇二年五月,已是九十高龄的他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我代表医院去看他,问他是否调个单独的房间或其他什么要求,他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不用麻烦了,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战时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王祖远

人是邓拓。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让晋察冀边区人民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征得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批准后,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当时晋察冀边区人才济济,中央领导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把他这一重任交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邓拓?看起来事出偶然,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三七年,邓拓来到晋察冀边区之后,就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平日里对毛泽东的只言片语都收集起来,不仅在报上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还将这些著作印成单行本在全边区甚至敌占区发行。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发表社论《纪念七全党学习掌

平县春意浓浓。一天,带领晋察冀日报社驻在雷堡村的邓拓把报社印刷厂厂长周明从马兰村叫来。周明一下马,邓拓就把决定出版“毛选”的喜悦告诉他:“文稿已经编出来了,选哪些不选哪些都是中共中央的指示,选哪些不选哪些都是中共中央的指示,选哪些不选哪些都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明从雷堡快马加鞭回到马兰,向全厂同志传达了邓社长布置的任务,全厂一片欢腾。各个工序都围绕这一任务制定了完成计划,伙房里的同志响亮提出:“要把饭菜做得再好一些,保证大家精力旺盛地工作。”担任校对的同志工作特别认真,一、二校逐字逐句地校正还不放心,三校时两人合作一人念一人校,力争一字不误。大家群策群力,原定五月定稿付排,可实际上到七月就印出了第一批样

章,八百多页、四十六万多字,除收集了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一九四四年公开发表过的二十五篇著作外,还选收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内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和结论。此书第一版印了平装本四千册,还印了精装本一百册。精装本由红、蓝缎做了书皮,上边烫印《毛泽东选集》五个金字,装帧得漂漂亮亮,谁见了谁喜欢。书被送到分局机关,院里马上围过来一大群人。刘澜涛同志把书捧在手上一个劲儿地夸赞,真是爱不释手。可惜,因为当时条件过于艰苦,就是平装本,边区机关干部也不够一人一本。于是,同志们就千方百计“磨”着邓拓要书。一时间,《毛泽东选集》成了全边区人人欲得的珍贵礼物,“毛选”的出版成了轰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大喜事。